

“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汉
学
文
库



俄罗斯汉学文库

БИБЛИОТЕКА РУССКОГО КИТАЕВЕДЕНИЯ

主编：李明滨 孙玉华

国图藏俄罗斯汉学 著作目录

陈蕊 编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俄罗斯汉学文库

БИБЛИОТЕКА РУССКОГО КИТАЕВЕДЕНИЯ

主编：李明滨 孙玉华

国图藏俄罗斯汉学 著作目录

陈蕊 编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国图藏俄罗斯汉学著作目录/陈蕊编著.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6
(俄罗斯汉学文库)

ISBN 978-7-301-19526-0

I. ①国… II. ①陈… III. ①汉学—图书目录—俄罗斯

IV. ①Z88:K207.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190298 号

本书获大连外国语大学资助出版

书 名: 国图藏俄罗斯汉学著作目录

著作责任者: 陈 蕊 编著

组稿编辑: 张 冰

责任编辑: 李 哲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19526-0/K · 0809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新浪官方微博: @北京大学出版社

电子信箱: zbing@pup.pku.edu.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9634 出版部 62754962

印 刷 者: 三河市北燕印装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650 毫米×980 毫米 16 开本 18.25 印张 300 千字

2013 年 6 月第 1 版 2013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49.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10-62752024 电子信箱: fd@pup.pku.edu.cn

俄罗斯汉学文库编纂说明

本书是“俄罗斯汉学文库”之一种,作为资料工具书先期出版,以供查索史料之用。

拟议中的“俄罗斯汉学文库”计 30 种,内含三类。

一、汉学家论文选集。以人为卷,选入俄罗斯科学院院士、通讯院士和大学教授 16 人,其中:

院士、通讯院士 7 人

1. B. M. 阿列克谢耶夫论集《论诗品与中国文学研究》
2. B. П. 瓦西里耶夫论集《儒释道与古典文学》
3. B. C. 米亚斯尼科夫论集《俄中关系的文化因素》
4. Б. Л. 李福清论集《小说与中国民间文学》
5. М. Л. 季塔连科论集《中国哲学与精神文化传统》
6. С. Л. 齐赫文斯基论集《中国现代革命史论》
7. Н. Т. 费德林论集《中国文学与文学史分期》

教授 9 人

8. А. А. 龙果夫论集《现代汉语语法研究》
9. И. С. 李谢维奇论集《中国古典文论》
10. Л. С. 佩列洛莫夫论集《孔子与儒学古今》
11. Л. Д. 波兹涅耶娃论集《中国文学史——古典与现代》
12. В. И. 谢曼诺夫论集《鲁迅与章回小说》
13. Е. А. 谢列布里亚科夫论集《曹靖华评传与诗词论》
14. В. Ф. 索罗金论集《元曲与传统戏剧》
15. 谭傲霜论集《汉语隐性语法》
16. С. Е. 雅洪托夫论集《汉语史论集》

二、作品研究论集。内容包括作品俄译版本和译者介绍、译本评析、俄国论者观点摘编。以作品为中心,按每部名著一卷,计 10 卷。有:

1. 《论语》在俄罗斯的传播
2. 《孟子》在俄罗斯的传播
3. 《道德经》在俄罗斯的传播
4. 《孙子兵法》在俄罗斯的传播
5. 《庄子》在俄罗斯的传播
6. 《易经》在俄罗斯的传播

7. 《西游记》在俄罗斯的传播
8. 《水浒传》在俄罗斯的传播
9. 《三国演义》在俄罗斯的传播
10. 《红楼梦》在俄罗斯的传播

三、资料工具书。设若干专题。有：

1. 国图藏俄罗斯汉学著作目录
2. 东正教驻京使团遗存文献书目
3. 俄国对西域的探险考察及所获文物的收藏整理
4. 汉文古籍流传俄国分类书目
5. 俄罗斯汉学家词典

“文库”已筹划有年，早在1999年9月编者就会同出版社编辑进行了一次“俄国之旅”，到朔方去搜寻文宝，同相关汉学家商讨编选的书目。此后，又与国内同行学者反复商议，确定选题，始成规模。

以俄罗斯一国之汉学编立文库，属国内首成，意义重大。唯文库内容既丰，预计费用亦巨，须待筹足资金保障出版，力求稳妥，故迟迟未予启动。

如今，承大连外国语大学校长孙玉华教授慨然答应，由该校资助先期出版本书，以带动后续。鉴于文库之学术价值，有长远意义，孙教授并允诺将文库出版事宜作为该校国际汉学推广基地的一项工作纳入计划，继续筹措经费，支持出版。

故此，一俟条件成熟，文库将尽快编定付梓，以飨读者，预计从“十二五”规划期间开始，将随经费到位程度，分期分批出版。

在此，谨对大连外国语大学和孙玉华教授预致谢忱！

李明滨
于北京大学六院
2013年3月20日

凡 例

本《目录》以中国国家图书馆(以下简称“国图”)的俄文藏书为基础,以俄罗斯从事汉学研究的著名学者为线索,将国图收藏的俄罗斯汉学著作目录做了细致的分类编排、整理。

编排上,为方便读者使用,仅以20世纪为界分为前、后两部分。前一部分:馆藏中的俄罗斯早期汉学研究文献没有设分科,而是将馆藏按学者收集,并对作者及其作品做了简单的介绍。重点强调的是其在俄罗斯汉学史上的影响及价值。

20世纪以后的作品,则按学者的研究方向,分成文、史、哲、经、政、艺等学科。在学科的编排上,没有只关注馆藏,而是按学者的研究方向及其作品分类。如:

В. И. 安东诺夫主要翻译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新法规》(1994)、《澳门特别行政区的组成》(1993)和编撰《台湾(商务手册)》(1993)等。虽然馆中只收藏有他翻译的《简明俄中中俄字典》,但在编排上仍按他的研究方向,将他归入“政治类”。

另外,在中俄关系史上有影响的人物,如Е. П. 科瓦列夫斯基(Ковалевский, Егорь Петрович, 1811—1868),是近代中俄关系史上的重要人物。虽然不能将他列入汉学家的行列,但他撰写过极有影响力的作品,所以本《目录》也将他收进来。

(1) 各学科内著者,按学者姓名的俄文首字母顺序依次排列。作品的排列,按出版年代由近及远排列。即:最新出版的作品排在前面,之后按出版年依次往前推。俄文的论著、译著在前;国内出版的中文译著、论著排在俄文原著之后。

(2) 学者传略的编写参考了:俄文版《俄罗斯东方学家辞典》(2008);俄罗斯近年出版的相关书著;《苏联百科词典》(1986);俄罗斯相关网站。其中有些部分主要依据李明滨《俄罗斯汉学史》(2008)一书的“俄罗斯汉学家简介”,以及俄文杂志《东方》、《远东问题》等。

(3) 馆内收藏的同一作品,不做重复录入,只保留馆藏索书号:意为一种2册、一种3册。

(4) 为保证对学者研究方向的全面了解,馆藏中著名汉学家的非中国学研究的著作也收在其中。如:著名俄国汉学家В. М. 阿列克谢耶夫院士的《Современная Турция》(1961)等。

(5) 整体编排上,由四部分构成:

a. 学者简介:出生年,出生地;毕业的院校;从事研究的经历;主要研究方向;重要作品等。

b. 原著:俄罗斯学者的论著、译著。

c. 翻译成中文的作品,以及中国学者对其的研究论著。

d. 国家图书馆馆藏索书号。

由于篇幅的限制,本《目录》:

(1) 仅收录了 256 位俄罗斯汉学家及其 2000 余部作品。编辑原则:一是馆藏作品数量较多的学者;二是知名度较高,在学科研究领域具有代表性的作品。

(2) 仅以俄罗斯汉学家为线索,收录的是有学者署名的原文论著、译作。而俄罗斯众多专门的汉学研究机构编辑、出版的作品不在本《目录》编辑的范围。

书目的编辑:

(1) 原文、译文书目包括:书名、作者(编者)、出版社、出版地、出版时间、页码;国图索书号;

(2) 中文论著以译成中文的作品为主,兼收国内学者的研究论著;

(3) 编辑的论著、译著,以第一编辑者、译者为主;多位编者的作品,均列在第一编者名下;

(4) 为方便使用者,在《目录》正文后,附有“人名俄汉对照索引”(后面简称“索引”)。“索引”后的数字序号:I、II、III、IV、V、VI、VII,分别代表 20 世纪后所划分的七个学科类别:

I —— 文学;

II —— 语言;

III —— 历史;

IV —— 哲学;

V —— 经济;

VI —— 政治;

VII —— 艺术;

使用者可以通过“索引”后面的数字序号,在目录中找到著者在《目录》中的位置。(没有标注数字序号的,为 20 世纪前的著者。)

(5) 本《书目》中的【索书号: 】均为国图馆藏索书号。

现代俄罗斯汉学和汉学家的著译

(代序)

李明滨

从20世纪初阿列克谢耶夫院士荣获北京图书馆“通讯员”称号之后,阿氏本人和门生后辈长期以来不断寄来译作和论著,加上中俄双方文化交流和对方采购,多条渠道所获,国家图书馆已拥有丰富的俄国汉学藏书,计为256位俄国汉学家的2000余部著作,足以称为我们对俄罗斯汉学展开调研和考察的资料基地。

为了解和使用国图馆藏汉学图籍,需要就俄罗斯汉学作简要的概览。

一、20世纪上半叶汉学全面开拓时期

俄罗斯汉学从18世纪初萌芽(从1715年东正教使团来京常驻起),初期发展缓慢,大体经过一百年左右才日臻成熟。从19世纪上半叶到20世纪初在俄国汉学史上先后出现三位划时代的人物:比丘林、瓦西里耶夫和阿列克谢耶夫。前两位分别代表19世纪上半叶和19世纪下半叶两个时期。后一位代表20世纪上半叶,为现代汉学时期。

曾被郭沫若先生尊称为“阿翰林”和“苏联首屈一指的汉学家”的瓦·阿列克谢耶夫(1881—1951),于1929年当选为苏联科学院院士。同年,他接到北京图书馆的前身北平图书馆副馆长袁同礼(馆长为蔡元培)签署的公函,正式特聘为北京图书馆“通讯员”(这是给外籍学者英、德、法、俄、美、日各一名的荣誉职衔,阿氏为该馆同期聘任的六位外籍学者之一)。这表明,阿氏的成就同时得到俄中两国的承认。如今北京国家图书馆还珍藏有阿氏的成名作——1916年出版的专著《中国论诗人的长诗·司空图〈诗品〉》,已属中国国内唯一的该书俄文原著初版本。

(一) 阿列克谢耶夫的重大贡献

1. 中西比较诗学研究的先驱

阿氏潜心研究唐诗十年,尤其是古代诗学。他完成的巨著(大开本790页)《中国论诗人的长诗·司空图〈诗品〉》(1916),不但用花品、茶品、鱼品、书品、画品来对照,藉以阐明《诗品》的成就和价值,还确定了它在中国文学上的地位,而且从诗学的高度来与欧洲的诗论作对比,包括古罗马诗人贺拉斯、法国诗人布瓦洛等等,从而确认“司空图的长诗在世界文学上应当占有一个极其荣耀的地位”,进而反对“东方就是东方,西方就是西方”,二者无可对比的观点,开了中西比较诗学的先河。

2. 拥有古典文学、文化和文学研究多方面成果

阿氏编选和翻译古典诗歌,并写成注释与论析,译介《聊斋志异》,搜集和研究民间年画,就中国古典文学、现代文学以及俄文译作写了一系列文章,在生前和身后陆续发表。先后成文集的有:《聊斋志异》(译作,1937)、《中国文学》(1978)、《中国民间年画——民间绘画中所反映的旧中国的精神生活》(1966)和《东方学》(1982),几部文集反映了他在汉学各个领域的拓展:语文学、民族学、史学、诗学、民间文学、美文学以及翻译理论和实践。

3. 毕生从事汉学教学

阿列克谢耶夫一生从事教育工作。1908年起即在中东铁路学院工作,1910—1951年在彼得堡—列宁格勒大学任教达40年,先后在地理学院和俄国艺术史学院(1919—1924)、东西方语言和文学比较学院(1924—1927)、列宁格勒东方学院(1928—1938)、列宁格勒历史语言研究所(后更名为列宁格勒文史哲研究所,1930—1938)、莫斯科东方学院(1937—1941)任教。其间,1933—1951年还担任亚洲博物馆(后为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中国部主任。除在中东铁路学院教授俄语外,在其他各院所均从事汉学教学。在40多年的教学生涯中,他提出和推行一系列全新的汉语教学法,造就了一大批汉学家。

4. 造就俄国汉学学派

阿列克谢耶夫对俄国汉学的特殊贡献,在于对汉学学科提出了系统的理论,孜孜不倦地建设汉学学科和认真严格地培养汉学人才,形成了“阿列克谢耶夫学派”。

在阿列克谢耶夫身后,齐赫文院士(1918—)成了这个学派的主导人物,据他的界定,该学派的主要成员有:研究哲学的休茨基、阿·彼得罗夫,研究文学的鲍·瓦西里耶夫(王希礼)、什图金、费德林、艾德林、费什曼、齐别罗维奇、克立夫佐夫、瓦·彼得罗夫、孟列夫、谢列布里亚科夫,研究语言的龙果夫、鄂山荫、施普林钦、雅洪托夫,研究汉字的鲁多夫,中、日兼研的聂历山、康拉德、孟泽勒,研究图书资料的费卢格、布纳科夫,研究艺术的卡津、拉祖莫夫斯基,研究经济的施泰因,研究历史文化的杜曼、齐赫文、维尔古斯、李福清。^①

这份名单实际上还应该包括推动20世纪下半叶汉学走向繁荣的一批骨干,他们已不是阿列克谢耶夫的嫡传,而是再传弟子了。例如,曾是

^① 齐赫文斯基:《瓦西里·米哈依洛维奇·阿列克谢耶夫》,“序:科研和教学活动简介”,莫斯科:科学出版社,1991;中译文见李明滨:《俄国汉学史提纲》,载阎纯德主编《汉学研究》第四集,中华书局,2000,第63页。

齐赫文的学生,目前任职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所长的史学家米亚斯尼科夫院士(1931—),和现任远东所所长的季塔连科院士(1934—)。

(二) 俄罗斯汉学的多方面开拓

在苏俄立国的初期,有两代学者参与新汉学的创建工作。老一代的汉学家以瓦·米·阿列克谢耶夫、谢·费·鄂登堡(1863—1934)、尼·瓦·屈纳(1877—1955)以及曾任海参崴东方学院第二任院长的德·马·波兹涅耶夫(1865—1942)为代表。

新一代的汉学家彼时也异军突起,在创建苏联新汉学中显示了异常的活力。早期有以着重研究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宣传中国民族民主解放运动的意义著称的康·安·哈尔恩斯基(1884—1943)、阿·伊文(笔名^①, 1885—1942)、弗·维连斯基—西比里雅科夫和阿·叶·霍多罗夫(1886—1949)等。像霍多罗夫就以在中国工作的亲身经历,加深了对中国的研究,在20年代发表一系列论述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中国解放斗争的文章,如《世界帝国主义与中国》(1922)、《同世界帝国主义斗争的中国与摩洛哥》(1925)、《中国革命的初期阶段》(1927)、《中国的民族资本与外国资本》(1927)。同样,伊文则写出《中国解放斗争的第一阶段》(1926)、《红缨枪(中国农民运动)》(1927)、《1927—1930年中国游击队活动概况》(1930)、《苏维埃中国》(1931)等著作一百多种。

新一代的汉学家不但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阐述中国革命,而且有不少人亲身经历了中国的革命斗争:或参加我国的北伐战争,担任来华的苏联军事顾问团的翻译,或担任孙中山领导的国民政府的顾问,或在苏俄政府派来驻华的外交机构工作,或当共产国际驻中国的代表。他们在协助孙中山执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改组国民党以及北伐战争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像当年闻名中国的巴·亚·米夫(1901—1939)曾于1927年到达广州、上海、武汉等地,并列席中共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1928年在莫斯科参加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米夫虽然曾在1930年到达上海支持过王明错误路线,但在长期担任(莫斯科)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副、正校长(1926—1929)、中国学研究所所长(1929年起)、共产国际东方部书记处副书记(1928—1935)的工作中对于宣传和支支持中国革命斗争、培训中国革命人才无疑起过很好的作用,他本人也以研究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而闻名于世,先后发表过著作50余种。

这些从事过与中国革命直接相关工作的人物,后来在汉学研究中都比较有成就。像担任过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部主任的格·纳·沃伊京斯

^① 原名为阿历克谢·阿历克谢耶维奇·伊万诺夫,主要研究中国近代史,曾于1917—1927年在北京大学任教,有著作100余种。

基(1893—1953),曾在革命时期被派到驻中国的外交机构(1926—1928)接着又担任共产国际东方部书记处副主任(1929—1934)的柳·伊·马季亚尔(旧译马扎尔或马加尔,1891—1940),都成了研究中国革命运动和封建社会问题的学者。

在这个时期,中国古典文学和书籍的翻译工作也大有进展。曾于后来完成《诗经》全本俄译工作的阿·阿·什图金(1904—1964)就是在这时开始崭露头角的。其他著名文学翻译家还有尤·康·休茨基(1897—1941)和王希礼等。同时,还出现了一批语文学家,如研究甲骨文的尤·弗·布纳科夫(1908—1942),研究西夏文的尼·亚·涅夫斯基(涅历山,1892—1945)和卢多夫。早已闻名我国的汉学家龙果夫(亚·亚·德拉古诺夫,1900—1955)则开辟了研究现代汉语语法的新领域,并同亚·格·施普林钦(1907—1974)等苏联汉学家一起探索汉字拉丁化的问题。在他们之前已有叶·德·波利瓦诺夫(1891—1938)进行了汉语语音语法研究的实践。符·谢·科洛科洛夫(1896—1979)编成了新的《汉俄辞典》(1927,1935)。而康·康·弗卢格(1893—1942)甚至已从事中国图书版本学的研究,写出中国印刷史。彼·叶·斯卡奇科夫(1892—1964)别出心裁,花了大量劳动编成《中国书目》(1932)一书,把1730年至1930年俄国和苏联所搜集到的有关中国的书籍、论文及资料(已发表的)尽数编列出来,为研究汉学史提供了线索。当然,有多方面成效的还是阿列克谢耶夫,他对汉字、汉语语音和词汇,中国的文学、美学、民间文学和戏剧等都有进一步的研究,其成果是苏联汉学新发展的标志。

据不完全统计,在1917年到1949年短短的30多年里,苏联出版的汉学成果就有约100部书,大大超过19世纪俄国的汉学成果。^①在下一个阶段,情况还要好得多。

苏联汉学成果则有以下三个方面。

1. 对当代中国的研究占有日益显著的地位。研究新中国经济问题的有曾任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1957—1958年来北京国际关系学院任教的维·亚·马斯连尼科夫(1894—1968),他发表《中国政治经济概况》(1946)、《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改造》(1956)、《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经济制度》(1958)等著作100多种。还有多次来华,1945—1948年长时间在中国东北工作,曾任苏联驻华商务代表的米·约·斯拉德科夫斯基(1906—1985),他发表《中国对外经济关系发展概论》(1953)、《苏中经济关系概述》(1957)、《苏中经济合作》(1959)等著述60余种。还有1951—

^① 据彼·斯卡奇科夫《中国书目》1960年版统计。

1954年曾在苏联驻华使馆工作过的叶·亚·科诺瓦洛夫(1928—)则侧重研究中国现代经济,主要的文著有《中国的农业合作化问题》(1956)、《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问题的社会经济方面》(1970)、《现代中国的社会经济问题》(1974)。

以研究中国社会政治问题知名的有维·格·格利布拉斯(1930—)和利·沙·屈沙强(1932—)。前者着重注意中国的国民收入、劳动和工资等问题,著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政治结构(50—60年代)》(1980)等。后者曾任《真理报》驻华记者(1962—1965),著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思想运动(1949—1966)》(1970)等。而曾任苏联外交部副部长的贾丕才(又译米·斯·卡皮察,1921—1995)则侧重对外政策,著有《苏中关系》等书。此外,还有奥·鲍利索夫的著作。

有一批学者继续研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如米·符·尤里耶夫(1918—1990)、弗·伊·格卢宁(1924—)、列·彼·杰柳辛(1923—)、叶·符·卡瓦廖夫和尼·帕·维诺格拉多夫(1923—1967)。他们有的曾任苏联报刊的驻华记者,有的来华进修过,都分别写出数量可观的历史著作。有的学者则在帝国主义侵华史的问题上下功夫,如根·瓦·阿斯塔菲耶夫(1908—1991)和鲍·格·萨波斯尼科夫(1907—1986)。

2. 史学领域的成绩更为突出。中国悠久的历史、丰富的史料以及纷繁复杂的历史现象、亟待解决的学术问题吸引了大批苏联汉学家的兴趣,他们在这个方面下的功夫最多。在史学领域的汉学家,研究的范围相当广泛,既有通史,也有断代史(古代、中古、近现代),还有类别史(社会史、思想史、文化史,甚至史学史)。如阿·瓦·梅利克谢托夫(1930—2006)和格·德·苏哈尔丘克(1927—)主要研究中国近代史和现代史。米·瓦·克留科夫(1932—),卢·费·伊茨(1928—1990)、拉·伊·杜曼(1907—1979)、列·谢·佩列洛莫夫(1928—)、列·谢·瓦西里耶夫(1930—)重点研究中国古代史,包括中国文明、种族和民族的起源,民族社会和阶级社会的产生与发展等。研究中世纪史的尼·伊·康拉德(1891—1970)、埃·巴·斯图仁娜(1931—1974)、格·雅·斯莫林(1930—)和拉·瓦·西蒙诺夫斯卡娅(1902—1972)也做出很大的成绩。特别突出的是康拉德院士,其涉猎范围已不限于史学,而是扩大到语文学以及东方学的其他领域,主要论文汇集成《康拉德选集·历史》(1974)和《康拉德选集·中国学》(1977),一向为苏联的汉学家们所推崇。而出生于哈尔滨的西蒙诺夫斯卡娅则对中国的农民起义有着深刻的研究,她的《中国伟大的农民战争(1628—1645)》(1958)和《17世纪中国农民的反封建斗争》(1966)颇有影响。此外还有研究中国古代外交史的维·莫·施泰因(1890—1964)、研究西夏史的叶·伊·克恰诺夫

(1932—)和研究女真族历史的米·瓦·沃罗比约夫(1922—1995)。

在近现代史方面也有几个著名的学者,如格·瓦·叶非莫夫(1906—1980)发表过《中国近现代史纲要》(出过不止一版)等著作100余种。还有瓦·巴·伊柳舍奇金(1915—1996)和罗·米·布罗茨基(1907—1992)等。出生于中国浙江省农民家庭的郭绍棠(阿·加·克雷莫夫,1905—1988)成就突出,他多次会见瞿秋白,有生动的回忆资料。齐赫文(谢·列·齐赫文斯基)院士尤为著名。他1935年就读于列宁格勒大学,1941年毕业于莫斯科东方学院,曾于1939—1940、1946—1949、1949—1950年数次来华,先后担任驻乌鲁木齐副领事、驻北京总领事和驻华使馆参赞,著有《孙中山——苏联人民的朋友》(1966)、《19世纪末中国的维新运动》(1953)等作品约200种。齐赫文于1964年起任东方学研究所所长,1968年当选科学院通讯院士,后为院士,苏中友协副主席。

尼·策·蒙库耶夫(1922—1985)在翻译中国历史文献、考证和发现历史资料上有突出的贡献。他翻译的《蒙鞑备忘录》(1975)、《13世纪蒙古历史的若干重要的中国文献资料》(1962),以及《耶律楚材墓志铭》(1965)都为苏联汉学界所重视。

此外,研究中国哲学史的有出生于浙江宁波的杨兴顺(1904—1989)和尼·格·谢宁(1936—)。研究中国社会思想史的有郭绍棠(克雷莫夫)等。从事史科学工作的有阿·阿·别辽兹内(1915—)、弗·尼·尼基福罗夫(1920—1990)和彼·叶·斯卡奇科夫(1892—1964)。

3. 语文学是汉学家最集中的领域之一,成果显著。从龙果夫开始就注意对汉语的研究,他发表《方块字文献和古代官话》(1930)、《汉语词类》(1937)、《古藏语音系特点》(1939)、《现代汉语语法研究·词类》(1952)、《现代汉语口语语法体系》(1962)等约50种。汉学界还进一步以汉语材料为依据论述普通语言学问题。瓦·米·宋采夫(1928—2000)、尼·尼·科罗特科夫(1908—1993)、尤·弗·罗日杰斯特文斯基(1926—1999)、谢·叶·雅洪托夫(1926—)对汉语结构问题很有研究。雅洪托夫研究汉语史的成果得到我国汉语学家的好评^①。米·库·鲁缅采夫(1922—),弗·伊·戈列洛夫(1911—1994)、尼·瓦·索恩采娃(1926—)、塔·芭·扎多延科(1924—)、安·费·科托娃(1927—)、纳·伊·佳普金娜(1928—)、叶·伊·舒托娃(1927—)、西·芭·杨基韦尔(1925—)等对汉语语音学、词法学和句法学很有研究。米·维·索罗诺夫(1929—)、伊·季·佐格拉芙(1931—)和伊·谢·古列维奇等则探讨中世纪的汉语结构,包括西夏语的研究等。索佛罗诺夫和佐格拉芙就分别写出分析《水浒》和《今本

① 雅洪托夫:《汉语史论集》,唐作藩、胡双宝选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第1—7页。

通俗小说》的语言现象的论著。196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的刘克甫(米·瓦·克留科夫,1932—)则在殷文的研究上取得进展,有许多论析殷代铭文和殷代文明的文著(1960、1962、1964、1967、1970、1973、1974等)。尤·弗·诺夫戈罗茨基(1928—1977)和索科洛夫在汉语方言研究上颇为突出。亚·格·施普林钦在汉语的社会语言学,雅洪托夫在古汉语语法,阿·阿·兹沃诺夫和弗·伊·热列宾在汉字的机器翻译问题上大有进展。同时在工具书方面,鄂山荫(伊·米·奥山宁,1900—1982)主编的《华俄辞典》从1952年问世以来,曾一版再版,颇具权威性。鲍·斯·伊萨廷科(1914—1965)的《汉俄发音词典(试编)》(1957)也很有影响。总之,苏联语言学家在中国语法、语音学、音韵学、社会语言学、语言地理学,包括古代和现代汉语等方面的研究都有成就。此外,他们在汉学的某些特殊的领域如敦煌变文方面也有研究,出现了知名的敦煌学专家孟列夫(又译缅甸希科夫)和1960年毕业于北大中文系、现已知名的佛教经典“宝卷”的专家吉·谢·斯图洛娃(1934—1993)。后者翻译的《普明宝卷》已于1979年出版。

在文学领域工作的汉学家为数更多,须要辟专文加以介绍。岂止文学,即使艺术也有不少人涉猎。如专门研究历史的埃·巴·斯图任娜也兼及中国的民族艺术。而曾于60年代来北大进修,从宗白华先生治中国书画史,后来一直从事中国古典艺术研究的哲学博士叶·符·查瓦茨卡娅(1930—)已写出《米芾》、《齐白石》等论著8部,其主要论著《中国古代绘画美学问题》也已出了中译本^①。

(三) 为20世纪后半世纪培养了一代文学名家

在这个时期中费德林(1912—2002)、艾德林(1909—1985)、索罗金(1927—)、波兹涅耶娃(1908—1974)发表了文学史著作,康拉德(1891—1970)在比较研究,费什曼(1919—1986)、谢曼诺夫(1933—)、沃斯克列辛斯基(1926—)在古典小说,艾德林、谢列布里亚科夫(1928—2013)在古典诗歌,李福清(1932—2012)、斯别施涅夫(1931—2011)在民间文学和俗文学,李谢维奇(1932—2000)、戈雷金娜(1935—2009)在古代文艺思想和文论,孟列夫(1926—)、索罗金在古典戏剧,切尔卡斯基(1925—1998)、彼得罗夫(1929—1986)、施奈德(1921—1981)、苏霍鲁科夫(1929—)、热洛霍夫采夫(1933—)、谢曼诺夫在现代文学,盖达(1926—)、谢罗娃(1933—)在戏剧领域都有研究成果。帕纳秀克(1924—1990)、罗加乔夫(1900—1981)、科洛科洛夫(1896—1979)、什图金(1904—1964)等则在翻译文学名著方面有突出成绩。在这30多

^① 查瓦茨卡娅:《中国古代绘画美学问题》,陈训明译,湖南美术出版社,1987。

年里,俄国有大批的中国古典文学和现代文学译作出版。

二、20 世纪下半叶俄罗斯汉学趋向繁荣时期

50 年代以来苏联汉学大发展,20 世纪后期研究机构数量剧增,以科学院系统的三大研究所——莫斯科的远东研究所(ИДВ РАН)、东方学研究所(СИБ РАН)和圣彼得堡的东方文献研究所(СПб ИВР РАН),以及莫斯大学亚非学院(ИСАА МГУ)、圣彼得堡大学东方系(ВФ СПб ГУ)“五强”为主,新增乌拉尔、新西伯利亚和海参崴的远东大学(ДВГУ)等高校,也已各自建成汉学中心。

其中以海参崴远东大学东方学院汉学系为中心,聚合海参崴工大东方学院、经济大学东方学院、哈巴罗夫斯克(伯力)师大东方系、布拉戈维申斯克(海兰泡)师院东语系,以及科学院远东分院东方历史民族学研究所的相关人员,形成了远东的一大汉学重镇。

汉学队伍改变了 20 世纪前期仅有一位院士阿翰林为整个汉学界领袖的局面,阿氏的门生、后辈已有四人当选为院士,分别成为汉学各分支学科的奠基人,即文、史、哲学科的领军人物。史学为齐赫文和米亚斯尼科夫,哲学为季塔连科,文学为李福清。

还有几位通讯院士和大批具有博士、副博士以上高级学衔的汉学家。其数量据统计,至 2008 年已有 612 人,比 90 年代初的 505 人,增加了 100 多位。至于中级学衔以下和大批刚毕业的汉学专业学生,那是更大的一个数字了。

其中,50 年代以后出生的一批汉学家开始崭露头角,如著有《中国古典哲学方法论》的科勃泽夫,《孔子传》的作者马良文,《高僧传》的译者叶尔马科夫,研究佛教文化的托尔琴诺夫,《中国文化史》的作者克拉芙佐娃,写成专著《王维创作中的禅佛思想》的达革丹诺夫,研究冯友兰《中国哲学史》的洛曼诺夫,东方文献所所长波波娃,以及莫斯科大学的卡尔波夫、刘华夏,圣彼得堡大学的罗季昂诺夫,远东大学的列别捷娃副教授、赤塔的科罗文娜副教授,以及汉学书籍出版家阿里莫夫等,均已在 80、90 年代成名。他们给俄国汉学带来了新成果,新气象。

80 年初,中苏恢复了停止 20 年的交往之后,引起汉学家们重新勃发的热情,他们经历了 50 年代高昂的交流热潮,60、70 年代的相对沉寂之后,竭力要找回逝去的 20 年代时光。这一时期顺着 50 年代的潮流,以更大的热情推进,竟致 80、90 年代兴起了“中国传统文化热”,直到 21 世纪初。

(一) 文史哲研究四杰

哲学家季塔连科(1934—)

汉学家们尤其重视考察传统文化思想在当代中国的运用。他们在

80年代跟踪探索中国的改革开放的成就、困难和问题,着眼于中国经验能否为俄国的改革提供借鉴。

季塔连科的成就特别引人瞩目,他自从1985年接掌远东所,便主动开展国际文化交流活动,几乎每年都应邀来华参加学术会议或讲学。他是北大教授冯友兰先生唯一的外国弟子,非常重视两国之间的情谊,充当了中俄文化交流的桥梁,知名度高,广受中国学界欢迎。

季塔连科1957年在莫斯科大学毕业,随即来华进修,于1957—1959年和1959—1961年先后在北京大学和复旦大学学习。他在北大期间受业于冯友兰教授,不但学哲学史,而且有跟随冯师深入农村经历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的生活实践,对中国社会与农民有了更为深切的了解。他在清华大学纪念冯友兰100周年诞辰会议的报告中提到,那段经历使他终生难忘、永久受益,从此更深刻了解了冯友兰的哲学思想。他早期以论文《古代中国的墨家及其学说》获副博士学位,又于1979年晋升博士。该文于1985年以《古代中国哲学家墨子及其学派与学说》出书后,曾被译成日文在东京出版。此后,他主编《中国哲学史》(1989)、《中国哲学百科全书》,均有较大的影响。

近年来,季氏在中国政治和现实问题上陆续推出几部著作:《中国:文明与改革》、《中国的现代化与改革》(1999)和《中国社会政治与政治文化的传统》(1994,与佩列洛莫夫合著)。同时,他在研究俄国与亚太国家包括中国的关系上,则有下列著作:《亚太和远东地区的和平、安全与合作问题》(1989)、《俄罗斯和东亚:国际与文明之间的关系问题》(1994)、《俄罗斯面向亚洲》(1998)、《俄罗斯:通过合作求安全·东亚的向量》(2003)以及主编论文集《中国在现代化和改革的征途上(1949—1999)》。他主编的五卷本大型的《中国精神文化大典》自2006年起陆续出版。

季塔连科正是由于在学术研究上广泛涉及哲学、现实政治和俄中及亚太国家关系,广有建树,同时在对外交流的实践中成效显著,影响广泛,颇孚众望,而于1997年当选俄国科学院通讯院士,2003年晋升为院士,并被推选担任俄中友协主席等多项重要职务。

史学家齐赫文斯基和米亚斯尼科夫

谢尔盖·列昂尼德维奇·齐赫文斯基,中文名齐赫文,史学博士(1953)、教授(1959)、通讯院士(1968)和院士(1981)。曾任苏联科学院中国学研究所所长,现为俄罗斯科学院主席团顾问,长期在外交部任职,领特命全权大使衔(1966年起)。

他主要研究中国近、现代史并以此成名。当他在40—50年代先后以副博士论文《孙中山的民族主义原则及其对外政策》(1945)和博士论文《19世纪末中国的维新运动》(1953)走进学术界时,立刻在苏联史学界显

得卓尔不群,也引起中国的史学同行之注意,尤其在两文修订成专著出版之后(《19世纪末中国维新运动与康有为》(1959)^①和《孙中山的外交政策观点与实践》(1964))。

它们与后来发表的专著《周恩来与中国的独立和统一》^②构成齐赫文中国近现代史研究成果的“三部曲”。同时,他还围绕着康有为、孙中山、周恩来这三位重要历史人物编辑出版了一系列历史资料和人物传记资料,包括专著,极为珍贵。如《孙中山选集》、《1898—1949年中国的统一与独立之路(据周恩来的传记资料)》(1996)。

齐赫文对中国社会有亲身的体验,有亲自参与或见证重大事变的经历,见证了新中国诞生这样的历史大事。在参加开国大典之后,他立即将周恩来总理兼外长的快函传递莫斯科,促成了苏联政府在次日,即10月2日发表声明公开承认并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他随即被任命为大使馆临时代办,成为首任驻新中国的使节。他的名字已经和两国关系史联在一起了,这是他外交生涯中最为荣耀的经历。更为详细的,还有齐赫文本人描述他在中国的经历和友谊的两本著作:《我的一生与中国(20世纪30—90年代)》(1992)^③和《回到天安门》(2002)^④。

我国《人民日报》(海外版)2001年9月7日头版以“世界著名汉学家聚会在北京研讨汉学”为题的报导特别指出:“从马可·波罗、利玛窦、雷慕沙、费正清、李约瑟,到齐赫文斯基等,这一连串名字,连接成‘西学东渐’和‘东学西渐’的桥梁”,给予齐赫文院士极高的评价。

史学家米亚斯尼科夫(1931—)主要研究中国近代史和中俄关系史,1955年毕业于外交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1964年曾来人民大学进修,1964和1978年先后获副博士和博士学位,1990年即当选为科学院通讯院士,1997年晋升院士。他长期在远东所任职,曾任副所长,至2003年调东方学研究所,为科学院顾问。现为俄国汉学家协会主席。

米氏长期致力于历史档案的挖掘与整理,主持编辑组连续出版了以《17—20世纪俄中关系(文献与资料)》为题的文集,计已出有17世纪两卷,18世纪两卷,19世纪两卷,20世纪五卷(其中有些卷册系与齐赫文院士或立多夫斯基联合主编的),还有关于两国人员来往、边界问题等类文件汇编。此项工作为进行研究提供很好的基础。

① Движение за реформы в Китае в конце XIX века и Кан Ю-вэй. М. 1959. 419с.

② 见中译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第604页。

③ Китай в моей жизни (30—60 годы). М. 1992. 159с.

④ Возвращение к Воротам Небесного Спокойствия. М. 2002. 387с.